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八一）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四八期 ——
（二〇〇八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805e）

【不堪回首】	文革狂涛中的知识份子	裴毅然
【劫后反思】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 ——以何炳棣等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访华观感为例	谢 泳
【抗拒遗忘】	作家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潘葱霞·谢海涛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不堪回首】

文革狂涛中的知识份子

• 裴毅然 •

一、必须拱倒的“社会基础”

苏联大肃反与中国文革，均爆发于夺取政权后近二十年之际。惊人的“相似性”缘于相似的政治内质：缺乏民主制度保障的革命党专政，只能重落容异度甚低的封建窠臼，阶级斗争正好成为翦除异己的意识形态现成工具，知识份子因其独立性价值追求向度必遭整肃清洗。东欧及朝越古柬等共产政权，均不约而同视知识份子为敌对力量。

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在刘公。但如此政治大动作，不可能平地起雷，必须烘云托月有所依凭，最关键的是必须得有明确的“革命对象”，方能构成“继续革命”的必要性。在文化普及度很低的中国，剑指知识份子，容易动员群众投入运动，毛泽东明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呵，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那里开刀。”

〔1〕反右已打趴下党外士林，这次必须“火烧”党内士子，才能敲山震虎，拉拽出他们身后的“赫鲁晓夫”。北京市委的“三家村”就这样成了最初的祭刀羊。

中共八届政治局委员、候委33人，文革中受迫害20人；八届中委、候委194人，“靠边站”96人（2）。连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都一度想自杀（3）。中共八届中委多为知识份子出身的开国功臣，不把他们集体摁下去，就无法拱倒党内理性力量的刘邓。但光批斗党内知识份子是不够的，党外知识份子也须拉来陪斗，这样才能说明党内党外串通一气，才能证明走资派确为阶级敌人在党内的代理人。茅盾一直在上天安门，也遭家中服务员的造反，领着红卫兵抄家。1949年以后知识份子文化边缘化，文革则完成政治边缘化。

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宣布：文革死了二千万人，整了一亿人，占全国人口的九分之一（4）。知识份子所占比例无从得知，但他们无疑是最痛苦最无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们是明确地必须打倒的革命对象。不过，知识份子的陪绑并非纯属“无辜”，从价值观念上，他们确实是“走资派”的社会基础，不搞倒他们，极左那一套便难以贯彻推行。何况，镇压知识份子在中国素有传统，北洋时期，“军阀镇压群众运动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农村教员和他们的得意门生抓去砍头”（5）。

面对文革狂涛，心理落差最大，日子最难过，心理最难平衡，自杀最多的，是那些一直自许为革命中坚的左派，尤其是那些反右斗士。其中名流有：老舍、邓拓、李立三、叶以群、范长江、赵九章、闻捷、杨朔、李广田、孔厥、罗广斌、周瘦鹃、俞鸿模、饶毓泰（中央研究院院士）、陈琏（陈布雷之女）、梁思顺（梁启超之女）、南汉宸（中贸委主任）、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傅雷夫妇、翦伯赞夫妇……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人：吴晗夫妇、马叙伦、李达、张东荪、潘光旦、田汉、冯雪峰、邵荃麟、赵树理、巴人、丽尼、彭康、海默、罗广斌、陈翔鹤、萧也牧、魏金枝、侯金镜、孟超、冯沅君、郑君里……

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常溪萍，将该校中文系几十位师生划右，超额完成揪右指标，1965年奉调北大参与该校社教工作队，又整了不少师生。文革前回华东师大，文革一起，被造反派扭着到处游斗，每间学生宿舍都可通过广播勒令他在指定时间接受批判，常溪萍跳楼自杀（6）。吴晗当年率先向“章罗联盟”猛烈开炮，在人大发表〈我愤恨！我控诉！〉，像一挺扫射的机关枪，掌声激起，深得眷恩，总以为与党的关系是通过战火考验的，也沦为“三反份子”，比右派还反动，这弯子怎么转得过来？一贯紧跟的曹禺只想一死了之，“我跪在地上，求着方瑞，‘你帮助我死了吧！用电电死我吧！’”曹妻方瑞则反过来求丈夫：“你先帮我死好不好？”（7）萧乾回忆：“对不少人来说，死比活着美丽多了，有吸引力多了。我也几乎加入了那个行列。……蹲牛棚时，每次上厕所我都在勘察死的方式和方法，琢磨哪根管子挂得住腰带，要是跳楼从哪里往下蹦。”（8）

北大生刘顺元，抗战后历任中共大连、济南市委书记，文革后出任中纪委副书记，文革中关入上海警备司令部地下室，双手从肩背反铐，饭倒在地上，要他趴地舔吃（9）。农村的批斗远比城市野蛮。县长、县委书记脖栓几十斤重的粪桶，一边斗一边往里扔石头，粪汁溅得满身满脸。有人熬不过，又一下找不到自杀“路径”，吃饭时将筷子插进鼻孔，用力往桌上一磕，筷子穿进脑子；有的自杀者跳了粪坑（10）。能否保持人格尊严成了知识份子的最后一道防线。

个人自尊与自杀成正比，与生存几率成反比。自杀成为保持尊严的“唯一武器”。1966年9月3日，诗人陈梦家在家中第二次自杀成功，遗言：“我不能再让别人把我当猴子耍。”（11）自杀者中以留学背景者为多，从香港回国的乒坛三杰——姜永宁、容国团、傅其芳，全部选择自杀，“一致认为”生不如死。然而，不要以为死了就一了百了，一句“自绝于人民”，依然让你死不安宁。

北大校园监狱——“黑帮监改大院”，关押着二百多名教职员。王力、朱德熙等著名教授“忝列其中”。“背错一个字（语录），立即一记耳光。每天晚上的训话，也是旧地狱中决不会有的。

每当夜幕降临，犯人们列队候训。恶狠狠的训斥声，清脆的耳光声，互相应答，融入夜空。”（12）北大被揪出“立案审查”者达九百多人（13），“牛鬼”们走路不许抬头，坐着不准翘二郎腿，整天写无尽无止的检查交代，不许丑表功、攀关系、安钉子，不许半点虚假。朋友相见，不敢说话，语不及私，只能“眉目传情”。为防说梦话，有人衔着手绢才敢入睡。稍一不慎，就是“现反”，一判就是十年。众多“牛鬼”向往监狱，那儿至少没有无时无刻的监督与随时可能落下来的拳棒。每一所五七干校左近都有一“附件”——几座或十多座新坟。

1968年6月23日，陈白尘日记：“下午文联各协会与生产队联合举行斗争大会，第一次被施以‘喷气式’且挨敲打。每人都汗流如雨，滴水成汪。冰心年近七十，亦不免。文井撑持不住，要求跪下，以代‘喷气式’，虽被允，又拳足交加。但令人难忍者，是与生产队中四类份子同被斗，其中且有扒灰公公，颇感侮辱。”（14）革命女将不准六十五岁的丁玲睡午觉（革命派与反革命总得有区别），不准她抬头（“看，她那仇恨的眼光！”）、不准她打鼾（破坏革命小将休息）、不准她不欣赏每晚低劣的宿舍晚会。青岛红卫兵挖开康有为的坟墓，把康有为带有白发的头骨挑起游街（15）。

萧乾记载：“到1966年红八月，革命就由阴惨惨变为血淋淋的了。丢在胡同口垃圾堆上的六条‘尸首’，有人说还没断气呢，就拉到火葬场去了。大孩子告诉我，他们高中那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的老教师被打死后，造反派非逼着校长在阳台上抱着死尸跳舞——他乾脆跳了楼。”（16）流沙河之妻为监禁的丈夫送饭，邻院廊楼上的工人射尿而下，浇淋其头发和饭篮（17）。一位女红卫兵将点燃的鞭炮塞到双手被绑双眼被蒙的“走资派”耳中，炸声响起，“走资派”倒地吱哇乱叫。有人责问是否太狠了，女将答曰：对付阶级敌人，还算轻的。

知识份子标准的政治贱民——臭老九（18）。每天必须将门打开，以便革命群众随时入室监督查抄、发布训示，每次进出亦须向治安委员立正报告（19）。两个孩子吵架，一个骂：“你哥哥是劳改份子，你以后也要当劳改份子！”另一个回敬：“你们家都是知识份子！你长大了也是个知识份子！”（20）

二、焚书·幽默·叫好

专政全凭知识少，反动皆因文化多；知识份子的代名词是“有学问的混蛋”，劳改队中地位更低，被小偷流氓呼为“吃屎份子”。湖南出了一句领导名言：“三个知识份子在一起就会反党！”（21）有人公开声称：“不把你们这些知识份子统统枪毙，就算便宜你们啦。”（22）

五四名士沈尹默在上海数度被抄家，六十多年搜藏的诗词字画古帖古书全部被运走烧毁。刘海粟被二十四次抄家，甚么东西都拿走了，六朝唐宋明清及自己的字画七八十件都没了下落。北大荒兵团某连，挖出一个埋藏很深的“阶级敌人”，罪行是传播黄色书籍——巴金的《春天的秋天》，判刑十五年。林风眠入狱四年半，没有理由也毋须理由，大量作品被浸入浴缸溶成纸浆冲走（23）。

1966年8月24日，北京123中学红卫兵涌进梁漱溟寓所，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梁氏三代京官所购珍本古籍、明清名家手迹、大量藏书，在院里烧了好几天。1967年2月，梁思成第三次被勒令搬家，只给二十四平方米一小屋，不得不尽卖藏书（包括其父的《饮冰室文集》），雇三轮车往废品收购站拉了一整天，共四十五车次，计售人民币三十五块（24）。华东师大教授许杰挂着“老右派”木牌，多年打扫学生宿舍厕所，老两口住在全校最破旧的狭小工房，煤炉就在边，藏书无处可放，大都论斤卖了废纸。《文汇报》右派吕文：“二十多年的体力劳动下来，平反后，我连字都不会写了。”（25）罚扫大街的路翎，家里竟没有一本书、一支铅笔、一页稿纸，已完全失去写点甚么的欲望与需要（26）。

文革期间，知识份子的智慧只能体现在好兵帅克式的幽默上，尽量不给残暴者发泄兽欲的机会。廖沫沙得以存活的原因在于其幽默性格——“等到他们动手扭胳膊，迫使我低头弯腰撅屁股的时候，……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头弯腰的时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用这样的咒语来分散肉体的不舒适和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与快乐。”（27）

黑色幽默的档次也愈来愈高。中央美院某学者被派往历史博物馆打扫女厕，他却从这一侮辱性的差事中找出闪光点：“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28）北大学生右派郑光弟，因硬不低头，进了铁丝网内的劳改队，实在熬不过去，自行了断。不过，方式特异。他将绳子一头拴在水塘坡的树根上，另一头捆住双脚，上半截身子顺着倾斜的塘坡栽向水中。树上留一纸条：“我因对未来绝望，而和大家诀别了。无论哪位路过这儿的仁人君子，只要像拉鱼网一样往上一提绳子，另一个世界的万物之灵，便又和“同类”见面了。”（29）邮局门口代写书信的捉刀人与与时俱进扩展业务，明码标价：家信一角，一般检讨二角，保证一次过关的深刻检讨五角（30）。

对绝大多数左派知识份子来说，文革属于“猝然降临”，他们手足无措莫知应对。那时，斯大林大清洗尚内幕不详，苏区早期肃反更讳莫如深。他们无法从革命的历史中找到对应的逻辑性解释。刚刚还在为革命欢呼高歌，转眼成为革命的对象，实在无法接受这种猝然转逆，也理解不了革命为何会成为革命者的苦海。尽管一再提高认识，一再自诫必须接受革命群众的帮助，但又怎么忍受得了完全的栽诬与相互揭发的尴尬呢？然而，悲剧之悲乃是文革之初，绝大多数知识份子完全认同“继续革命论”，即使“触及皮肤”，也认为是必要的，怪只怪自己水平太低，理解不了运动的“伟大意义”。他们都以“紧跟”为荣，为没有资格“效忠”顿足捶胸。他们认真真写日记，学习王杰每天自问五十个“为甚么”，查问每一行为的对错。多数知识份子非常虔诚地接受批判，祈求脱胎换骨灵魂净化；竭力说服自己去承受种种侮辱、宽容那些殴打自己的革命派。只是“我本将心托明月，谁知明月照沟渠”。

于光远回忆：“文革刚发动的那会儿，我都是把它们当作一场原则性的党内斗争来接受的，自己也努力反省自己在思想上是否有不符合党的要求的缺点和错误。”（31）季羨林说：“我自己在被打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的时候还度信‘文化大革命’的正确。……一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我一直拥护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的‘革命’。”（32）梁思成病情恶化无力外出，令妻子每天抄回有关他的大字报，“还有各种‘革命组织’印发的众多‘揭发材料’和‘首长讲话’，他都如饥似渴地读着。我们不断努力去接受这些大字报上的‘革命’观点，拼命想跟上‘群众’的步伐。”（33）杨沫跟丈夫辩论：“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场大革命还能不对么？”（34）

50年代初的思想改造运动，“脱裤子”、“割尾巴”，已打掉知识份子的价值自信，从根子上否定了他们此前的人生经验，使他们学会了以“原则”代替感情（沈从文语）（35），首先思想投降自我怀疑，乖乖地没错找错。吴宓在思想改造运动后说：“我皈依毛公陛下之心将进而虔诚寅敬矣！”（36）红色教授冯至的口头禅——“伟大的时代，渺小的我。”（37）至此，个人权利被名正言顺地褫夺。知识份子的这一价值退让，不仅使中国沦为政治全控型社会，也使自己沦为“最可欺负的人”。巴金甚至称姚文元“无产阶级的金棍子”（38），为打在身上的棍棒叫好。失去本能意识，甘于思想自虐，乃是最深刻的文化悲剧。

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右派与久受压抑的知识份子的心态。文革初期，他们虽不理解，却从心里拥护。“右派”蓝翎坦白：“‘文革’刚开始时我不理解，但也拥护。心里想，每次你们不是斗人家吗，这次也让你们味道。”（39）1959年右倾挨批吃瘪的郭小川，在检讨书里泄愤：

“旧作协批判了邵荃麟，我感到十分痛快……现在看出来，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我从内心深处痛恨我自己，也痛恨周扬们。我更是愿意揭发他们这些王八蛋的。”（40）

文革中还有重要一景：几乎所有自杀者都高呼领袖万岁，表现出对革命的不二忠心。虽身蒙重冤，但革命本身却是千对万对。没有人对革命本身、对领袖存有任何怀疑。如邓拓、吴晗、翦伯赞……1966年8月2日，叶以群跳楼自杀，遗书妻儿：“唯一要求你们的，就是坚决听党的话，坚决站在党的立场上，逐步认清我的罪恶，激起对我的仇恨，坚定不移地与我划清界限！……最后一句话就是要求你们认真读毛主席的书，听共产党的话！为党立功！”（41）知识份子诸多社会功能——预警神经、理性闸门、人文尺规等，丧失殆尽。

三、艰难的觉悟

最初就能看穿文革迷雾的，只能是远离庐山的“老甲鱼”——章士钊、章乃器、张治中等。章士钊致信毛刘想当“和事佬”，张治中撑持病体上天安门欲劝止毛泽东的文革脚步。章乃器的态度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42）章伯钧与罗隆基则早在文革前得知《大英百科全书》新添条目——“章伯钧、罗隆基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下，要求实行民主政治”，便认定毛泽东违宪，“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43）

中小知识份子能够挺身而出者，除了个人道德勇气，还须拥有异质思想资源。文革前已下狱的林昭，幼年为基督教徒，这使她能依据教义发出质疑，她向《人民日报》等单位寄发公开信，表示对曾膜拜为父的毛泽东信念破灭，指斥毛是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中国正沦于暴政之中——“剥夺人所有尊严的社会”。青工遇罗克撰写《出身论》，其思想资源乃是基于平等自由等西方人文理念。囿于思考能力，绝大多数青知只能发问无力解剖。1977年被枪毙的王申西迷惑不解：“为甚么青年时代的毛泽东曾那么大力与禁锢着他精神发展的种种社会桎梏作斗争，但他走上政治舞台后，却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带上更严厉的精神桎梏？”（44）贺绿汀之女贺晓秋凭直觉抵抗，以自杀“对抗文革”。她对审讯者直言：“对“文化大革命”，我想不通，我就是想不通，我也不愿意想通！”（45）

就知识份子整体来说，能够从理性层面上进行批判反思者，寥若晨星。辨析乌托邦的难度在于它那件新丽闪光的外衣——终极解决一切社会弊端，使人很难一下子认清内裹的旧货。何况出于对国民党的厌恶及强大的民族情结，知识份子亟愿承认新政权的合法性。陈寅恪、吴宓、余上沅一再拒绝飞台；冰心夫妇、钱学森、萧乾等海外投归。《观察》杂志1947年公布的七十九名撰稿人，除十余人外，大多留居故土（46）。中小知识份子对新政权的欢呼声自然更高，90年代末仍健在的一些新闻界“右派”，当年均为中小自由知识份子，感情上对新政权一面倒，包括与国民党关系十分密切者（47）。虽然对新式意识形态不熟悉或不认同，但不可能全力抗御。更何况，“大同”型的均贫富具有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乃是中国士子的千年梦寐。老舍1965年诗云：“滚滚横流水，茫茫末世人；尚无共产党，荒野鬼为邻。”（48）周瘦鹃得毛接见后，将毛给的一枝香烟掐灭带回，供奉玻璃罩中（49）。1957年3月，傅雷给在波兰的儿子写信：“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他们（指波兰）的知识份子彷徨，你可不必彷徨。伟大的毛主席远远地发出万丈光芒，照着你的前路，你得不辜负他老人家的领导才好。”（50）

50年代初，新政权禁毒禁娼禁赌，取缔帮会，最初的廉洁自律，知识份子认为政权与公正叠合，听党的话与追求自由并不矛盾，一切批评已无必要，一切均可寄托“组织解决”，自甘工具自弃独立。虽然思想改造运动使一些知识份子产生疑惧，但大多还是从积极方面理解并支持新政权。较之政治方面的暴力，文化价值上的认同才是“艰难觉悟”的致因。

1991年，九十一岁的夏衍仍天真地说：“中国知识份子这样真心地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

党，而四十多年来，中国知识份子的遭遇又能如何呢？众所周知，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拔白旗，1964年的文化部整风，以及“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首当其冲的恰恰是知识份子。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找不到顺理成章的回答，只能说这是民族的悲剧吧。”〔51〕像镇压知识份子如此长时间大规模的集体行为，如果仅仅归结为毛的个人原因，显然难以成立。缺乏意识形态与制度的护航，即缺乏一种强大的集体意志，是不可能走得这么远的。高龄夏衍还想不清，只能说明他深陷庐山之限。左翼文士理性反思能力整体偏低，缺乏从根子上检讨的价值起点，大难过后也难产生有质量的剖析。

四、失去理性堤坝之后

中组部1983年统计，全国各级领导人八十一万，大学文化只占6%，高中22%，初中以下72%〔52〕。党委系统尤甚，县委一级大学程度仅为5%〔53〕。文化低的在上面，无知管理有知，老粗管老细；青少年管中老年，学生指导教师；半文盲陈永贵、纺织女工吴桂贤当副总理……全社会价值结构倒置，幼稚的求学者反而拥有拣选传授何种知识的决定权。缺乏人文底蕴的“革命人民”，不可能无师自通地走向理性；斩断经验的继承，不可能有序地实施管理。大破四旧只能是大破文物，血腥武斗只能是为一派之利。原因很简单，“新一代革命人民”不可能真正大公无私。自己解放自己，靠甚么去解放呢？还只能凭那点乱哄哄的本能直觉？无知的掌权者只能干无知之事。一时间，医院不收治出身不好的“阶级敌人”，红五类病人批斗黑五类病人，邮局不给被抄家户送信送报〔54〕。

失去知识份子所维护的人文价值，人际关系陷入有史以来最为变形异化的丑恶时期。人人处于“时刻准备着”，不是去批斗别人就是被别人所批斗，自己的臀部挨了踢，便去踩别人的鸡眼。拈草木为刀兵，指骨肉为仇敌。师生成仇，友朋互揭，父子相残，夫妻反目。护士妻子给被审查的丈夫打针，先高呼打倒口号，然后再行“革命的人道主义”。韦君宜与女儿关系甚密，但在家中仍警觉收口：“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有一天我要被你出卖的。”吴祖光曰：“我们这里变成了一个爱听假话，爱说假话的假大空世界。不会说假话，惯说真话的都被弄去改造，改造到会说假话了才叫做改造好了。”〔55〕虚伪成为生存“常识”，全社会生活质量降低到生物学的蔬菜水平。

一位“幸运”的知识份子说：“我承认我是“幸运儿”，但这不是命运之神对我特别恩赐，而是我汲取了50年代的政治教训后所精心设计的一条人生道路。……我必须扭曲自己，必须装傻、装无能、装糊涂，叫人家看不上我，对我没兴趣才行。天天打磨自己的性格棱角，恨不得把自己藏在自己的影子里。”〔56〕

在革命的名义下，践踏了最基本的人性理念，将阴暗凶残的兽性一面释放出来。礼崩乐坏之下，“甚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四川某地武斗，抓到对立派俘虏，扒下裤子，划开肛门拉出直肠，拴系在压弯的竹梢上，然后松开竹子，竹梢弹上天空活活拽出那人肠子〔57〕。还有挖眼珠、刀旋肛门、往人身上浇淋滚烫开水〔58〕。霸占“黑五类”妇女，美其名曰“给你换换成份”〔59〕。唐山大地震，一位爬出废墟者，妻儿仍压在瓦砾下，向邻居求助，但此人多年整人结怨四邻，得到的是一道道冰冷的目光，妻儿因长时间无人扒救，活活窒息而死〔60〕。

文革对意识形态的破坏力更是难以估计，在重估价值的旗号下，否定了一切经验理性凝成的理念与秩序，否定了一切个人的合理性，甚至包括存在价值。除了毛的个人权威与空虚的“革命”，全体国人生活在价值真空中，没有任何需要绝对维护的价值理念，一切处于“相对论”之中，均可“因时而异”、“因领袖而移”。1977年，吴有训去世前特约于光远谈话，“我以为谈物理学方面的事，见面才知道原来是他想上书中央，希望中央号召淡化家庭观念。”〔61〕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撰文——“人权不是无产阶级口号”。“清官比贪官更坏”成为马列史学最新结论。

暴力高压与信息单一,成功压制了知识份子的思维,超越政治许可成为绝对不敢沾碰的异端。“人民必须忠于领袖”而不是“领袖必须忠于人民”,全国思维整齐单一,认为只要守着马恩列斯毛就可搞定一切,革命群众碰到的任何问题,领袖们都已天才预见并作出英明指示,凡夫俗子毋须思考只须注释。文革时期,《红旗》发行量一千万、《人民日报》五百余万,丙辰清明天安门广场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发现,大家的思想都是一样的”(62)。大陆知识份子已被整体剥夺——从物质到精神,脊梁崩塌,自觉或不自觉地避谈国事,完全失去选择公共话题的意愿,更不用说判断与设计价值标准。否则,1979年引领西单民主墙风骚的“政论家”,就不会是魏京生、任畹町等青工了。

全社会失去动力机制。大到政治鉴定、评级定薪,小到登记结婚、孩子入托,都掌握到单位人事科手里。单位头头上至司法下至行政,权力无边。高度集权造成社会成员集体丧失主动性,国人从入学到就业到流动,毫无个人自由。80年代初,沈从文、萧乾、汝龙、丽尼家属等人住房,均靠年近八旬的巴金奔走呼叫才得解决(63)。1978年恢复职称评审,华东师大六十岁的钱谷融(三十八年的老讲师)居然连副教授都没评上(64)。在这样的现实面前,加上脑体收入倒挂,知识份子还能干甚么——除了全力争取从知识份子行列中脱籍。

众所周知:经济的杠杆必须一头系在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上,另一头才能系在社会整体的发展上。文革后,重新承认这一古老的ABC,你还不得不承认是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改革”,正如千家驹所说:“这些经济学常识的再认识我们是化了高昂的代价的,……建国之后化了三十五年的代价,才懂得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常识。”(65)

五、结语

有人希望文革永远埋葬在经历者的记忆中,希望知识份子再大度一把,不要再撩揭这块伤疤——“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据说这还是中华民族重获振兴的“金玉良言”。可是,这回知识份子不那么好说话了,他们集体说:“不!”尽管老一代知识份子大多谢世,尽管他们的控诉受到这样那样的封堵,但他们还是留下了“集体记忆”。随着时间推移,历史的对比只会使文革的荒谬更强烈更凸显。而且,像笔者这样的“文革少年”,尚在中年,真正的“人还在心未死”,会同意“遗忘政策”么?冯骥才一文题为——〈文革进入了我们的血液〉。

巴金掷言:“太可怕了!十年的折磨和屈辱之后,我还不能保卫自己叙说惨痛经历的权利。十年中间为了宣传骗局、推销谎言,动员了那么多的人,使用了那么大的力量,难道今天只要轻轻地一挥手,就可以将十年“浩劫”一笔勾销?!“浩劫”绝不是文字游戏!”(66)邵燕祥痛斥文革:“……是数千年皇权专制主义在二十世纪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回光返照。它的反文明、反理性、反人道,因其持续时间之长,而且发生在八亿人口的大国,对人民的荼毒之深之广,甚至超过了希特勒纳粹对其国内的祸害。”(67)一位曾在草原深处搞“两弹”的党员工程师说:“如果世界上还有比原子弹更厉害的东西,那就是“文化大革命”!”(68)文革使知识份子终于彻底认清了共产乌托邦只能走向螺旋型意义上的封建大复辟,明白了正当的目标必须经由正当的途径,暴力最终只能通往独裁。

文革还愚弄了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这样的“紧跟型”知识份子,当大幕落下时,他们的心境十分悲凉。一人得色,全国向隅;毛居然企望“管理地球”,而绝大多数国人处于挫败之中,精英智慧集体萎缩,知识份子失去工作权利;中国能由此走向“共产主义天堂”么?当然,彻底终结文革,记录与控诉只是第一步。争取多元开放、以切实的制度具体保障民主的落实,

防止领导人的严重出偏，已明确成为“第二步”。新一代知识份子深切认识到：若不从制度上进行实质性变革，民主自由不能落实到可操作层面，沿着旧辙旧道——行政与立法一体、缺乏监督与竞争，那么一切美好的愿望都会在实际操作中变形，最终必将走向彻底的反面——以自由的名义否定自由，以革命的名义镇压革命。

最后，我必须向那一代“价廉物美”的知识份子致敬：萧乾自杀被救，其妻痛曰：“早知如此，何必当初。你要是1949年去了剑桥，这十七年，你起码也是个著作等身的剑桥教授了。绝不会落到这步田地。”萧乾神色凄厉，但加重语气说：“想那些干吗！我是中国人，就应该接受中国人的命运。”（69）新华社“右派”女记者邵琮表示因鸣放划右受难“始终无悔无疚”（70）。

注释

1. 李锐：《李锐论说文选》（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176。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1980年11月2日）。转引自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页749。
3. 叶永烈：《陈伯达传》，下册（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页548—52。
4. 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学术讨论会的书面发言稿）（2003年12月）。2004年1月25日李锐在新华社黄亭子食堂春节聚餐会上宣读。参见何方：《“延安整风”与个人崇拜》，《当代中国研究》（普林斯顿），2005年春季号，页128，注20。
5. 威尔斯（Nym Wales）著，陶宜、徐复译：《续西行漫记》（Inside Red China），第一版（北京：三联书店，1991），页246。
6. 徐中玉：《历史真相的一角——追念许杰先生》，载邓九平主编：《中国文化名人谈恩师》（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3），页300。
7. 曹禺：《曹禺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页166。
8. 《萧乾自白》，载邓瑞全主编：《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上册（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9），页231。
9. 艾宁：《智慧老人》，载邓九平主编：《中国文化名人谈恩师》，页450。
10. 冯骥才：《一百个人的十年》，首卷（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页30。
11.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关于迫害、监禁与杀戮的寻访实录》（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页32。
12. 季羨林：《牛棚杂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05），页9。
13. 同注11，页90。14 陈白尘：《牛棚日记》（北京：三联书店，1995），页98。
15. 章立凡：《君子之交》（香港：明报出版社，2005），页91。
16. 萧乾：《改正之后：痛定思痛》，载《往事随想。萧乾》（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页221。
17. 《流沙河自白》，载邓瑞全主编：《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册，页643。
18.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加上叛徒、特务、走资派、臭知识份子，故得称。
19. 张紫葛：《心香泪酒祭吴宓》（广州：广州出版社，1997），页412。
20. 李炜：《对“知识份子”一词的反思》，《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3期，页244。
21. 同注1，页509。
22. 《文洁若自白》，载邓瑞全主编：《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册，页796。
23. 吴冠中：《尸骨已焚说宗师》，载邓九平主编：《中国文化名人谈恩师》，页363。
24. 林洙：《梁思成之死》，载沈展云等编：《中国知识份子悲欢录》（广州：花城出版社，1993），页362。
25. 魏承思：《中国知识份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178。

26. 绿原：〈路翎这个名字〉，载沈展云等编：《中国知识份子悲欢录》，页180。
27. 转引自李辉：〈风雨中的自嘲——读廖沫沙《瓮中杂俎》〉，载李辉编著：《书生累——深酌浅饮“三家村”》（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273。
28. 黄永玉：〈平常的沈从文〉，《书屋》，2000年第1期，页17.29 〈丛维熙自白〉，载邓瑞全主编：《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册，页742。
30. 沙叶新：〈“检讨”文化〉，载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页59。
31. 于光远：《文革中的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页23.32同注12，自序页1、211.33同注24，页355。
34. 〈杨沫自白〉，载邓瑞全主编：《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下册，页462。
35. 〈沈从文自白〉，载邓瑞全主编：《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上册，页21。
36. 同注19，页232。
37. 马嘶：《负笈燕园——1953—1957：风雨北大》（北京：群言出版社，1999），页229。
38. 巴金：《随想录》（北京：三联书店，1987），页256。
39. 李辉：《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页197。
40. 郭晓惠等编：《检讨书——诗人郭小川在政治运动中的另类文字》（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页186、208。
41. 叶舟：〈叶以群的最后十年〉，载沈展云等编：《中国知识份子悲欢录》，页333。
42. 同注15，页87。
43. 章诒和：《最后的贵族》（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页367、335。
44. 转引自李锐：《李锐近作——世纪之交留言》（香港：中华国际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03），页266—67。
45. 叶永烈：〈不屈的音符——贺绿汀在“文革”中〉，载沈展云等编：《中国知识份子悲欢录》，页497。
46. 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命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页396—99。
47. 同注25，页135—47。
48. 周艾文：《素馨的栀子花》（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页59。
49. 周瘦鹃：〈难忘四月十五日〉，载《姑苏书简》（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页61。
50. 傅雷：《傅雷家书》（北京：三联书店，1981），页117—18页。
51. 夏衍：《懒寻旧梦录》（增补本）（北京：三联书店，2000），页450。
52. 同注1，页601。
53. 同注1，页553。
54. 同注10，页57、61。
55. 吴祖光：《往事随想。吴祖光》（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页269。
56. 同注10，页311—12。
57. 陈开民：〈唐·吉诃德之旅〉，《社会科学报》，2002年8月15日，第8版。
58. 邓瑞全主编：《名士自白——我在文革中》，上册，页233；下册，页685、784。
59. 遇罗文：〈北京大兴县惨案调查〉，载宋永毅主编：《文革大屠杀》（香港：开放杂志出版社，2002），页35。
60. 陈永弟：〈唐山地震纪实〉，《报刊文摘》，1992年1月14日摘转。
61. 同注31，页87。
62. 严家其：《我的思想自传》（增订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页33—34。
63. 晓未：〈一代翻译大家汝龙的辉煌业绩和苍凉后事〉，载沈展云等编：《中国知识份子悲欢录》，页479。

64. 吴中杰：《海上学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页170。
65. 千家驹：〈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现代化运动〉，《知识份子》（纽约），1986年冬季号，页59。
66. 同注38，页8。
67. 高增德、丁东编：《世纪学人自述》，第六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页452。
68. 同注10，页75。
69. 同注22，页781。
70. 同注25，页143—44。

□ 原载《二十一世纪》2006年2月号总第九十三期
~~~~~  
【劫后反思】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与事实判断  
——以何炳棣等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访华观感为例

• 谢 泳 •

—

本文选择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访华言论为研究对象。

所谓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主要指当年在西南联大工作和生活的人。所谓访华言论，主要指他们七十年代初访问中国后，回到美国公开正式发表的评价中国的文字言论。这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情况见下表：

| 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简况 |           |         |    |       |        |
|---------------|-----------|---------|----|-------|--------|
| 姓名            | 生卒年       | 联大期间    | 专业 | 至美国时间 | 首次访华时间 |
| 何炳棣           | 1917—     | 1939—45 | 历史 | 1945  | 1971   |
| 杨振宁           | 1922—     | 1938—45 | 物理 | 1945  | 1971   |
| 王浩            | 1921—1995 | 1939—46 | 哲学 | 1946  | 1972   |
| 任之恭           | 1906—1995 | 1938—41 | 物理 | 1941  | 1972   |
| 陈省身           | 1911—2004 | 1938—43 | 数学 | 1948  | 1972   |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七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还在文革当中，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都生活在物质极度短缺，精神极端压抑的环境里。这个时期中国人生活的一般状态，无论是历史、政治还是经济研究者，都认为是基本事实。但1971年后回国访问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却对中国人的真实社会生活处境毫无察觉，而且异口同声对当时处在文革中的中国社会作出了高度的认同和评价，这种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失察现象，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某些特殊情感，这种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具有普遍意义。解读这种感情背后的历史原因，对于深入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有很大帮助。

二

作为历史学家的何炳棣访问中国后，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演讲：《从历史的尺度看新中国的特色与成就》。他说：“从历史的角度看，新中国的革命，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史上最彻

底的革命。只有彻底的革命才能使中国人民在基层当家作主。惟有人民当家作主，新中国才能凭借组织和思想教育的力量把全民族的精神、人力、物质、新旧技术全部动员，‘自力更生’地逐步经济建国。以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的国家，在短短二十四年之内，能克服种种的困难，建设起一个不愧为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就不可谓不大。”（1，p 3 2）

他还对中国做了这样的预言：“我深信新中国广义的建国，包括经济建国，一定会成功。最重要的理由是新中国有旷古未有的组织能力……此外，这次民族生死存亡的革命斗争的成功，使得一个已有七千年历史的民族脱胎换骨，返老还童了。这次革命的成功，是民族性格与灵魂的彻底澄清剂。试想，在我（生于一九一七年）受小、中、大学教育备尝国耻之苦之时，怎敢相信今生今世会看到一个‘阿Q式’忍辱待毙的民族一变而为一个艰苦卓绝、坦诚果毅、忧思深远、勤朴武健的民族？！这才是人类史上最大的奇迹！能造成这种奇迹的民族，一定会胜利地完成建国工作。”（1，p 3 4）

对当时文革中的中国政策，何炳棣认为：“最后，我们应该了解，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国家政策决不是仅仅为了当前的建国工作，而且是为了防范历史上一些制度、社会、经济等等弊端的重演。”

他最后预言：“新中国对积累的历史经验有深刻的了解，经过层层的组织和教育网，更能把历史经验和理论动力缜密配合起来，高瞻远瞩，既力争目前，又着眼未来。从治史者的观点，我有勇气无条件地指出，人类自有史以来，从来没有比新中国开国的气魄和规模更加宏远的了。”（1，p 3 4）

杨振宁回到美国以后，发表了多次演讲。他的《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一文，曾发生过很大影响。杨振宁的观察是：“我发觉今天的中国是完全地改变了，和二十六年前我所认识的中国已完全不同。而这也就是我今天晚上想报告的事。在我还没有分别指出这些大变动之前，我想归纳一下我所见到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1）他对当时中国高等教育的评价是：“我最感兴趣的，并且也是跟这里的大学有戏剧性的不同的，就是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文化教育大革命是在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一九七零年已大致上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它各方面的行政。”（1，p 3 8）

对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杨振宁发现“今天中国普遍的生活条件依然很低，但最低限度不会感觉到粮食缺乏。农村和城市都是这样。不仅是米及面粉不缺乏，蔬菜与水果也是极多的。当我在北京、上海、合肥等地的街上行走时，我看到这现象。价钱方面也很便宜。我还留意学生们、工人们及农民们吃些什么。我曾经同大学生们一起吃饭。在上海，我还在一间柴油机厂与工人们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学生食堂的伙食还好一些。”“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产品方面现在已能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了。”（1，p 4 6）

他还把所见到的农民与过去相比：“我将他们敏锐的观察力同二十六年前的农民相比较。以前的农民承受了数千年的传统，他们往往认为他们的祖先是贫穷、挨饿的，但他们却仍然会因循着祖先的旧路走去。相比之下，我们可以见到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的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的巨大。”（1，p 4 7）

他这样评价当时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流行想法，以为生活在强调‘为人民服务’的气象下，一定使人成为奴隶，不能笑、心情一定不会是轻松愉快的。我自己也是存着这种想法进入中国的。后来，我发觉这种想法是完全错误的。”他在演讲最后用了毛泽东的两句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来表达“所得到关于中国人的精神的印象”。有听众问他，文革

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有没有一个数字时，杨这样回答：“我并没有具体的数字。但是他们告诉我，而我也相信他们，这个数字是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由此杨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领导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1，p 37）

王浩文章的题目是《中国之行的几点观感》。他说：“早期的人主要想到要中国富强，后来更具体一点，想到要一般人民生活过得去，国家能有自卫能力，一般人民和整个国家都能抬得起头来。我想绝大多数人都承认中国今天已做到了这一点：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坏，多数人充满朝气，国土完整，帝国主义的势力已被排出，政治经济完全独立自主。有些人说，‘碰巧’在共产党当权的时候，中国站起来了。我觉得这话说得太轻松。一百多年以来，也试过各式各样的办法，不但没有成功，反把国家弄得每况愈下。回想到解放前一个多世纪的历史，我们都会觉得要治一个非常重要的病，是需要很厉害的药的，很多有志之士大约都有过一种情愿为救国而吃苦的决心。”（1，p 78）

王浩认为当时的中国人生活：“同我一九四六年出国以前比较，有许多大家都看到的基本进步。我觉得多数措施都从长远处、根本处着眼，先满足大多数人的起码的要求，而不分散精力去锦上添花。今天的中国，可以说做到了丰食足衣。无论在城市和乡间都看不到像以前穿得非常破烂的人。关于食物问题，近七、八年来，可以说达到相当彻底的解决，与衣食关系密切的防旱防洪工作，成绩可说是旷古未有的。军人从贫贱可怕变成了生产教育方面受尊敬的领导人物，整个国家由一盘散沙变成严密的组织。很多人觉得组织太严密了，但有人说矫枉必须过正。”（1，p 75）

任之恭在《阔别二十六年的中国》一文中认为：“现在新中国社会里，最坚强的基础，可说是精神建设。精神建设的推动力，确实就是毛泽东思想。这思想是一个彻底革命、踏实建国的原理。”（1，p 129）

任之恭从三方面来说这个问题：“机会平等。新中国现在主张，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人与人之间，一概以机会平等为原则。所以贫与富平等，女与男平等。这就是说，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有什么特殊情形，绝不能允许他压迫或剥削另外一个人。例如在解放军里面，各级长官（或士兵）都穿一样的制服，不管职位高低，任何人没有特殊的权利。在家庭里，男女完全平等，各人可用自己的姓。又如一位职位很高的党员，绝不能压迫一位非党员。”

任之恭说：“我在中日战争结束以后数月（一九四六年）内离开中国，直到二十六年的去年夏天（一九七二年夏）首次返回国，亲眼看到那么多翻天覆地的变动。试问在仅仅二十多年中间，一个腐败到头的社会如何能够一旦翻身变成一个朝气蓬勃精神品德崇高的新兴国家？我愿冒昧答复，其中的原因一定是中国广大群众，痛心旧中国的不振作，受了毛泽东伟大思想的感动，全国毅然决然地坚持一条信仰，用最大的努力，创造出古今罕有的革命和建设事业。”（1，p 139）

陈省身在《见闻与感想》中提到，当有人问到文革时知识分子是不是愿意去农村时，陈省身说：“他们是愿意的。去公社工作是会提高这个教授的威望而不是会让人看不起的。判断这件事，一定要置身在中国的环境里，当然我不能做到，因为我只去了中国一个月，但是从我和那里教授们的谈话中，我觉得他们为曾去公社从事劳动感到骄傲。”当有人问他中国的犯罪率时，陈省身回答：“这是一个全世界最安全的国家，绝对没有理由要担心个人的安全。”（1，p 136）

当听众问到中国“是不是会有传闻中的严重压迫”时，陈省身回答：“并没有。在你所说的情况之下，他们会用很温和的方式对待你，他们会与你讨论，设法说服你，你必须考虑中国的过去，才能判断这个国家目前的进步。我看到人民公社的时候，心里总是很感动的。因为在过去，一个农人遇到荒年时，可能要卖掉自己的子女的，而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再发生的了。至于自由的问题，由中国的历史来看，我想中国人现在拥有的自由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中国人从没有西方民主制度的经验，当然他们并不拥有许多西方社会里的自由。”（1，p139）

本文提到的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何炳棣是历史学家，陈省身是数学家，王浩是哲学家，杨振宁、任之恭是物理学家。他们的专业背景大体可以代表人类知识的基本范围，同时他们在这些专业领域具有公认的世界性地位，可以说是名符其实的华人精英。他们早年在西南联大这样具有民主和自由传统的高等学府生活过，同时在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中长期生活。作为独立的中国知识分子，至少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他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是完全中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但他们对文革中的中国社会却做出了与事实完全相反的历史判断。这样的错觉源于他们的知识背景还是政治原因？现在看来都不是。他们当时对中国现实的评价，完全出于自觉并且发自内心。现在没有材料能证明当时他们受到了政治压力或者中国当局对他们做过统战工作。何炳棣、杨振宁、任之恭都写过较为完整的回忆录，丝毫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一个基本事实是二十多年后，杨振宁、何炳棣有明确言论，对他们当年对中国的失察做了反省。杨振宁说，十多年以后，有一位新闻记者问他：“你于七十年代初讲了新中国很多好话，你今天怎么评价你当时的言论呢？”他回答说：“我那时没有了解文革的真相，我承认我是蹩脚的新闻记者。可是请注意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2，p101）

何炳棣晚年提到他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访华的观感时曾说：“至今不少海外爱国人士仍劝我在文集中把它重印，我却愿意把它忘掉，因为它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同样愿意忘掉的是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所撰有关中国资源和经济前景的一系列文章。”（3，p393）

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五位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访华观感，都用了比较的眼光。需要注意的历史事实是他们都是战乱中离开中国到美国去的，当时战乱中的中国情景，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连年战乱，导致民不聊生，特别是下层社会极端贫困，这样的历史情景曾经刺激了当时还在学生时代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盼望中国统一、安定、强大，不再受外人的欺侮，是当时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内心的渴望。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普遍对现政权产生反感，在思想深处普遍产生左倾萌芽。所以在去国二十多年后，看到国家统一成为基本事实，看到社会成员有组织的集体生活和早年留在记忆中的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印象比较，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过于强烈的民族情感，让他们很难再调动自己的知识和学养去理性分析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情况。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曾见过一些亲朋故旧，虽然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那些他们所见的人，不可能对他们大胆讲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实生活处境，再加上当时他们到中国来的国宾身份，所到之处看到的是一片光明。

当时中国在接待外宾方面所表现出的虚假作法是普遍现象，常常是提前排演，或者用政治手段威胁外宾的亲朋故旧，不让他们讲真话，再有就是临时装扮外宾所要到的机关场所和亲戚家里的生活条件等等。但有一个问题在困扰人们，这样的行为难道会天衣无缝吗？这些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均是智慧超群之士，当时经历也是阅尽沧桑，何以会对此一切毫无察觉？合理的解释是他们不可能一点没有察觉，是他们强烈的民族情感不忍心让他们在西方那样的处境下，再来对自己的祖国提出批评。这种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的历史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

统一渴望的极端表现。以事实判断，他们不见得对当时中国的真实生活没有一点自己的独立观察，但对国家统一的强烈感情，让他们的理性失去了对事实的反省。杨振宁的“我不是以一个新闻记者的身份或心情去中国的”的心境，何炳棣的“虽有史实与感情，但对国内新气象只看到表面，未能探索新气象底层真正的动机”的说法，都是很好的证明。家国情感超越事实判断，统一意念妨碍知识分析，信息阻塞导致背离常识，轻信国家强大产生民族幻想，这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当时的基本思想状况。当先入为主的观念和情感主导思想时，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事实的判断，可能会不如一个家庭妇女。

1962年，杨振宁在日内瓦和他的父母见面。他父亲数学家杨武之告诉杨振宁：“新中国使中国人真正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在研制原子弹）。从前常常有水灾旱灾，动辄死去几百万人，今天完全没有了。”当杨振宁父亲讲得正高兴时，他母亲打断了他父亲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排队站了三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当时杨振宁的感受是“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4，p12）杨振宁访华前十年就有这样的经历，但这并没有影响他对中国的认识。

另外一个原因是早年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发达国家出现的问题，特别是物质文明发达后出现的一些社会现象，与他们在儒家文化环境下生成的价值标准发生冲突，常常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矛盾，一方面认同西方文化的基本价值，但一方面又简单否定这种文化中出现的负面现象，他们不愿意放弃真实的西方生活，但同时思想和观念中强烈表现对故国的情感。王浩在西南联大的同学何兆武曾说：“王浩在国外是左派，拥护新中国，有一阵改学马克思主义，想知道马克思到底是怎么说的，学习得很起劲，所以他从来不去台湾。”（5，p227）

1973年，穆旦在西南联大的同学王宪钟从美国回来看他，他的孩子们在议论此事时流露出抱怨情绪。但穆旦严肃地告诉他们：“美国的物质文明是发达，但那是属于蓝眼睛、黄头发的，而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穆旦还说：“物质不能代表一切。人不能像动物一样活着，总要有人的抱负……中国再穷，也是自己的国家。”（6，p139）

黄仁宇在自传中曾提到过，吴文藻和谢冰心都是在美国受教育，但“他们却毫不掩藏对美国政策的不满。他们就读东京美国学校的子女对同学说，他们家会回中国大陆去住（他们一年内做到了）”。（7，p141）

1971冬天，冯友兰听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后，写出“东河昔游地，及见旧邦新”的诗句。第二年冯友兰和梁漱溟见面，“谈话间，梁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合法地位事十分高兴，因此对毛泽东十分佩服。”（8，p516—517）

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普遍对于从事观念和知识活动较为轻视，所以很难摆脱成王败寇的思维。黄仁宇在《黄河青山》中提到当时一个美国博士多克·巴内特（Dock Bennett）的感觉。他认为“民主同盟令人失望。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理想色彩浓厚、诚心诚意的人，虽然怨气冲天，但毫无解决问题的逻辑。”（7，p196）

黄仁宇说在巴内特访问过的成员中，“没有一位能对问题提出前后一致的解决之道。原来民主同盟不过是知识分子的结盟，没有真正植根于中国社会。被谋杀的教授之一是诗人闻一多，他和持有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罗隆基一样，都在美国受教育，念过芝加哥艺术研究所和科罗拉多学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延伸到学术圈和出版界以外的地方，但是由于他们的背景使然，特别讨好那些以概念方法来了解中国的美国观察家。他们都说同样的语言，因此在这些不幸的

中国学者身上看到了自己。但说来矛盾，这些中国学者批评美国、赞美苏联时特别有劲，因此许多国民党官员受够他们的偏心和嘲讽，称他们是‘罗隆斯基’和‘闻一多夫’”。〔7，p196〕

黄仁宇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是同一辈人，他们共同的人生经历和处境（特别是后半生在西方生活的经历），很容易产生思想共鸣。黄仁宇在他晚年的回忆录中曾肯定延安道路的历史意义。他认为“至于特定的发展，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7，p477〕

了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背景，可以设想，如果黄仁宇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回到中国，他对中国的观感，也会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相同，至少作为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当时并没有看出中国历史的真相。是何炳棣缺乏观察历史真相的知识准备吗？不能这样认为。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7—8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 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 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9，p33〕

从这段史料可以判断，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的失察，主要不是知识的原因，而是民族情感所致，特别是联系到当时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主权地位这一事实，就更容易理解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感。

### 三

一个睿智的知识分子，如果不想被某些表面的现象所迷惑，必须在思想上保持对某种制度的基本判断，这种判断依赖知识背景，排斥个人情感，理性的支撑以思想为基本后盾。

在历史上，对极权制度产生错觉的现象并不鲜见。有些是看到了真相，但出于各种考虑把真相留给历史，当时只说出假象，比如罗曼·罗兰；但也有一些知识分子，出于良知和勇气，敢于背叛自己的理想和知识信仰，比如纪德。但更多情况下，对极权制度的错觉来源于基本理念和思想倾向。

1926年夏天，胡适对莫斯科作过三天的访问，后来他在给张慰慈的信中，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基本作了肯定的评价，为此他曾和徐志摩发生过一些争论。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面对苏联，何以会与徐志摩对苏联的评价完全不同？其实主要还是对真实情况的了解程度和知识观念之间发生了偏差。因为他当时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思想上并不清晰，所以所见也就不同，观念不清晰，怀疑就无从谈起。而徐志摩一开始就对这种制度保持警惕。

1925年徐志摩到苏联去，但徐志摩笔下的苏联却是这样的情景：“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益发的明显。”〔10，p573〕徐志摩写《欧游漫录》前后关于苏联的言论，完全是批判性的。

徐志摩对莫斯科的感觉是：“但莫斯科？这里没有光荣的古迹，有的是血污的近迹；这里没有繁华的幻景，有的是斑驳的寺院；这里没有和暖的阳光，有的是泥泞的市街；这里没有人道的喜色，有的是伟大的恐怕，惨酷，虚无的暗示。暗森森的雀山，你站着；半冻的莫斯科河，你流着：在前途二十个世纪的漫游中，莫斯科是领路的南针，在未来文明变化的经程中，莫斯

科是时代的象征。古罗马的牌坊是在残阙的简页中，是在破碎的乱石间；未来莫斯科的牌坊是在文明的骸骨间，是在人类鲜艳的血肉间。莫斯科，集中你那伟大的破坏天才，一手拿着火种，一手拿着杀人的刀，趁早完成你的工作，好叫千百年后奴性的人类的子孙，多的来，不断的来，像他们现在去罗马一样，到这暗森森的雀山的边沿，朝拜你的牌坊，纪念你的劳工，讴歌你的不朽。”（10，p576）

1936年，纪德到苏联参加高尔基的葬礼，写了著名的《访苏归来》等一系列文章。纪德本人是苏联的同情者，认同社会主义事业。但他在苏联十周的经历，完全改变了他对苏联的印象。在莫斯科，纪德的感想是：“在这里，关键是让人人相信，已经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幸福，以后会更好；还让人相信任何地方都不如他们幸福。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防范同外界（我是指国界之外）的一切交流。正是借助于这种做法，哪怕生活在同样水准，甚至水准明显低的情况下，俄罗斯工人也自认为很幸福，比法国工人还幸福，而且幸福得多。他们的幸福是由希望、信赖和无知构成的。”（11，p28）

纪德观察到“苏联公民对国外一无所知。更有甚者，他们还都确信，外国各个领域都远远不如苏联。这种幻想始终巧妙地维系着，这的确很重要，每个人即使不太满意，也还是庆幸受这种制度保护，会免除更大的苦难。”比纪德早一年到过苏联的罗曼·罗兰，同样看到了真相，可惜当时不敢写出来。1935年夏天，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到苏联访问，他在苏联的观察分为两面，一是真实的感受，一是表面的客套。罗曼·罗兰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写在日记中封存，要求在五十年后公开。可见当时对苏联的观察并不是有没有真实判断的问题，而是有没有勇气讲出真实的问题。纪德和罗曼·罗兰的观察恰好说明这一点。

罗曼·罗兰在《莫斯科日记》中说：“苏联公民的自尊，都以歪曲真相的代价而得到强化。来自国外的消息本来能使苏联劳动者对他们国境之外的世界上的事态具有正确的概念，但这种消息却遭到系统的隐瞒和歪曲。我确信，他们倾向于低估，并且有时甚至是过分低估其它民族的生命力。”（12，p113）

1932年，费边社的创始人韦伯夫妇到苏联访问，后来出版了《苏联印象记》，韦伯夫妇对苏联的印象很好，完全是正面评价。他们认为：“苏联的民众已经认识清楚，社会环境的压力，以前曾剥夺他们充实的生命之自由与机会，现在这压力却经过了改造，给予每一个人选择职业与选择居住的较多的自由，给予每一个人较多的休息与假期，给予每个人较多的消费品，给予每一个人较大的责任与酬报，使每一个人估量他自己的能力，有积极参预集团工作的机会。”（13，p72）韦伯认为社会环境的统制与改造“确实将增进他们个人的自由。”

因为韦伯夫妇在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所以对苏联的感受也非常自然趋于正面评价，但历史最后证明，早年对苏联的正面评价，其实是历史的错觉造成的。

1945年夏天，郭沫若对苏联进行了五十多天的访问，后来写出了《访苏纪行》，郭沫若对苏联的观察自然完全是正面的。他认为自己是抱着“唐僧取经到西天去的精神到苏联去的”，因为“苏联值得学习的东西太多了。”（14，p317）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总之，对一种制度的深刻洞察力，常常取决于知识分子的基本思想倾向。这一点，我们从瞿秋白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写出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同样道理，1972年，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前后到中国来的意大利电影导演安东尼奥尼，对中国的观察却与他们完全不同。

1973年纪录片《中国》上映不久，周恩来会见杨振宁。杨振宁对周恩来说：“我不知道



周总理是否认识安东尼奥尼，他是意大利很有名的导演。去年来中国访问了很久，后来又拍了一个电影。这个电影我没看过，一般看过的中国人都不喜欢。后来，我看了一个比较左倾的小报纸，上面有一个中国学生的分析，我觉得很深入。这个人大概是个学电影艺术的，他说，这个电影表面上看不错，但如果你对安东尼奥尼过去的电影手法有点了解的话，你就知道他是在恶毒地攻击中国。他举了一个例子，在电影结束时有两个场面，一个是有一群小孩在那里玩，接着是一个木偶戏的场面。他的意思是说，中国的小孩都变成了木偶。”〔15〕此事曾在中国引起轩然大波。〔16〕但历史证明，杨振宁、何炳棣等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对当时中国的观察，不如一位西方电影导演深刻。当年中国著名的《参考消息》上曾不断转载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访华观感，而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却受到了批判。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如今愿意忘掉当年对中国的观感，而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却成了纪录片的经典。

参考文献：

〔1〕何炳棣等。留美中国学者访华观感集，香港：七十年代杂志社，1974。  
〔2〕徐胜兰 孟东明。杨振宁传，香港：三联书店，1993。  
〔3〕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4〕杨振宁文录，海口：海南出版社，2002年。  
〔5〕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写。上学记，北京：三联书店，2006。  
〔6〕陈伯良。穆旦传，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7〕黄仁宇。黄河青山，北京：三联书店，2001。  
〔8〕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稿，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9〕吴宓日记第6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0〕韩石山编。徐志摩散文全编上册，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11〕安德烈·纪德著、李玉民译。访苏归来，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2〕罗曼·罗兰著、夏伯铭译。莫斯科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3〕韦伯著、邵宗汉译。苏联印象记，上海：生活书店，1934年。  
〔14〕郭沫若。洪波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  
〔15〕陈东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电影〈中国〉引起的风波，党史博览，2006（6）。  
〔16〕中国人民不可侮——批判安东尼奥的反华影片，〈中国〉文摘，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

□ 原载2007年第6期《开放时代》

~~~~~

【抗拒遗忘】

作家徐星的“文革”编年史

• 潘葱霞 • 谢海涛 •

1972年，一个16岁的北京少年，第一次写了情书，给一个比他高两个年级的女孩。情书的字里行间里，没有多少卿卿我我，更多的是这个饱受精神煎熬的少年对眼前现实的怀疑和追诘。

这封情书让同样单纯的女孩陷入了迷茫和恐惧，最后，她决定把它交给自己最信赖的班主任老师。接下来的结果便是，少年被公安局抓走关了起来。

30多年后，女孩特地从美国赶到中国，在镜头面前，讲述自己当年如何伤害了无辜，一

同回忆曾经的“文革”编年史。

2008年2月19日晚7点，上海。曾经的青涩少年此时正坐在一间小型放片室里，黑暗的周围是一张张平静的脸：大学教授、电影工作者、记者、大学生。56人的房间座无虚席。

在公众的视野里，这个已经52岁、叫徐星的作家，是一个温和的愤青。1985年，曾是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勤杂工的徐星，其处女作《无主题变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立刻引起轰动，被评论界认为是与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齐名的中国现代派小说的开山之作。

但这一次，作家徐星被关注的是拍了一部纪录片——《我的文革编年史》。

在中国内地，“文革”依旧是历史的禁区。大众传媒、大中小学教材，鲜见其踪影。上世纪80年代，巴金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馆”的设想，至今未获官方回应。由于题材的敏感性，《我的文革编年史》注定是一部不能在电影院公映的纪录片。

在这部8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徐星的初恋故事只是一个切入点。影片按照从1966年到1976年的顺序，用一个个发生在“文革”中的事件贯穿了全片，把观者带入40年前那段不堪的岁月。徐星既是一个自述者，讲述自己在十年中的遭遇，以反思被扭曲的人性；又是一个寻访者，以拍片者的身份回访“文革”事件，以唤醒被掩盖的公众记忆。两条线索在影像里并行而交叉，照见普通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里浮沉。

◇ 没有找到一個敢于忏悔者

“1966年，我刚刚十岁，记得那年夏天，天气炎热，阳光刺眼，生活一夜间全变了……”

随之而来的，是跳忠字舞的红卫兵，除四害时一车一车的麻雀……一个异样的年代扑面而来。

“随着暴力的升级，父母们开始不允许孩子们到街上去玩儿，可是我看到的这些，既让我恐怖又让我觉得新奇，好像有一种不可抗拒的魔力在。”

“1968年，父母为了我能受到完整的学校教育，把我从他们的下放地送回到北京，从此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生活。”

“从12岁时开始，我有了一个让大多数孩子羡慕的机会，每年两次单独上路去看望远在甘肃的母亲，很快我就迷上了这种路上的生活，学校再也不能吸引我了，与父母的愿望相反，我不仅没能好好上学，几乎成了一个流浪儿。”

1966年的中国，正发生着刚满10岁的徐星无法理解的事情：批斗、大字报……那时，他的父亲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技术人员，后被打成右派；母亲是医生，随医院迁至甘肃，姐姐在内蒙插队，哥哥在怀柔，一家六口，就他一个人呆在北京。

每年两次去甘肃的一路上，徐星看到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火车里挤得和罐头一样，跟在学校里听到的，完全不一样。饥饿、贫穷、孤独，使得他从12岁起就是一个怀疑论者。

少年时的经历在徐星的印象里是如此强烈。长大以后，他慢慢懂得一个道理：暴力——无论是实施者还是旁观者，它都会像毒品一样，足以使人上瘾。20年后，这番经历最终化为他

记录历史的作家梦，又10多年后，化为拍纪录片的动力。

“四十多年后，我知道对于我和很多人来说，这些并没有过去……为了童年的记忆，我找到了一个个默默记录着当年那些血腥的地方。”

徐星是2006年开始拍片的。这一年，“文革”结束30周年，他把多年的思考写成了剧本。

最初，他试图复原一些红卫兵的记忆，“我想做他们当年挺英雄主义的那种，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生活千差万别——我就想跟他们聊天，想听听他们怎么看待当年的英雄主义。”

2006年春天，他带着法国摄影师去了哈尔滨、重庆、南京、韶山等地。但他很快发现，很多普通人不愿意面对镜头。

在长达两年的拍片过程中，徐星没有找到一个敢于忏悔者，没有人敢在镜头前，说自己在“文革”中打过人、抄过家。

“没有一个人”。徐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这种遗憾的感觉，在他采访卞仲耘事件时最为强烈。

◇ 被遗忘的公共记忆

“校园的一角，一锅炉工推着的平板车上，马桶盖下露出一双脚，身上流出的粪便沥沥拉拉流在车下，我认出了是校长……”

片中，当年的北师大女附中学生冯敬兰讲述着她目睹的卞仲耘被打死后的场景。

画外音则介绍，“这是一所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校，有非常好的老师和教学传统，学生中大多有很好的家庭背景，国家领导人也把子女送到这里。40多年过去了，至今没有一人站出来说一声：当年是我打的人，我错了……”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面对徐星，悲愤交加：“（学生打死老师）这是历史上空前的暴行！”

北师大女附中副校长卞仲耘，是“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教师，她死于1966年8月5日，她的死拉开了“文革”中“红八月”杀戮的序幕。

卞仲耘死后，9岁的小女儿发现，父亲王晶睡的草席的边沿都被咬碎了。而在妻子被害的第二天，王晶到西单商店买了一架120照相机，拍下了妻子布满伤痕的遗体。他把妻子遇难时的东西都保留了下来：一件沾满血迹、用黑墨写上“打倒”二字的白色短袖衬衣，一条沾有粪便的裤子（她被打得失禁），一块表链被打得扭曲的手表，时间停摆在3点40分，1966年8月5日3点40分。一年后，王晶在家里的柜子里为妻子布置了秘密纪念堂。柜子的门是关紧的，但里壁贴着卞仲耘的照片，照片前供着鲜花。（王友琴《艰难的控诉：卞仲耘被害四十年后》）

祸不单行。1966年8月4日至6日，王晶三天内失去了世上最亲近的三个人：爱人卞仲耘、他们夫妇年轻时就认识的朋友祁式潜和刘克林。

原《大公报》名记者、中宣部国际司干部刘克林是8月6日傍晚在中宣部跳楼自杀的。

纪录片里，作家、诗人刘自立回忆父亲自杀当天的情景：“父亲中午临上班前，将一个月的工资交给我，这个举动不同往常。我在家里并不管钱……。”16岁的刘自立觉得有些意外，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直到傍晚，同楼的邻居敲开家门，对他说“你爸爸死了”……

刘自立再次出现在纪录片里，是在1968年1月的批判会上。当年的校友、作家徐晓曾站在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言。“那时的风气是，台上发言的人一喊打倒，红卫兵就扯着被斗人的头发扬起脸来示众。自立被带上台时穿着囚徒的棉衣，脚上戴着镣铐，剃了光头，没有头发可以扯，便抠着眼窝。”批斗结束后，刘自立在校门口被押上囚车。

纪录片没有介绍刘自立当时的思想转变过程。

2008年2月27日，面对记者，刘自立说了许多：当年，父亲的“叛党自杀”，并没有影响自己的“革命”热情，他的立场并未完全转变，与父亲“划清界限”和对父亲的刻骨怀念，双双并存。但很快，他因质疑“血统论”，攻击领袖罪，于1967年8月身陷囹圄。

在监狱的10个月，他学《毛选》，背诵《矛盾论》、《实践论》，对于批判，不屑一顾。他认为自己的理念是正确的。但1968年1月的那次批判会，却深深触动了他。触动他的，并不是批斗本身，而是一种亲情的负累。

批斗结束那天，他默默地望着姐妹追随囚车的身影，不敢喊出声来，怕连累了她们。车越开越远，她们消失在远处，他收回视线。这段记忆，始终在他的心中挥之不去。他说不清楚，这种感情震撼是怜恤还是后悔，是自责还是愤恨。

多年后，刘自立在评价徐星的这部纪录片时，充分肯定它侧重普通人受难的叙事角度。刘说：“普通人是‘文革’最大的受难者。他们都是非正常死亡，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他们的‘政治身份’，决定了他们的无辜死亡。这是用民疯代替民主的革命！”

在刘自立看来，纪录片没有触及悲剧发生的深刻原因——何以那个社会突然之间陷入疯狂和暴力？

这个过去40年的历史，在此后的社会中并无反思和发掘：关于卞仲耘之死以及“文革”十年的文字和研究，一直凤毛麟角。

在这部纪录片，没有讲到刘自立和徐晓以后的命运。大概在1969年或1970年，出狱后的刘自立，第一次读到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那些对于民疯和纳粹的批判——使他的思想受到极大震撼，确立了他今后观察问题的角度。

徐晓也在经历着很多事情：地下阅读、被诬入狱……慢慢开始了反思。“文革”结束后，她和刘自立在著名的文学刊物《今天》相遇，曾经的“阶级敌人”成为朋友。

◇ 两个故事两阵苦笑

“1967年8月24日，母亲带着我们到李子林投奔亲戚。上午11点左右，走到毛线沟屠宰场对面时，突然枪响了，第一枪打我，我走在最前面，母亲在中间，席庆川在后面。因为我一直处于武斗的环境里，加上人年轻，反应比较快，赶紧喊卧倒。这时，第二枪响了，就

听见母亲‘啊’的一声倒下去了，痛苦地捂着胸部，我扑到母亲身上，看到鲜血从她衬衫渗出来，我马上撕下自己的衬衫去堵伤口，血不断往外涌，母亲绝望地望着我，我大声地狂叫妈妈妈妈。但她的眼睛定住了，死死地看着我。这时，对方又朝我们开枪。我站起来，狂舞白衬衫朝对方大声喊：我们是老百姓。但是对方又用机枪扫射过来，我扑倒在田埂下，子弹打在周围‘噗噗’作响，枪声一停，我爬过去看母亲，她完全断气了，子弹从左乳下射进，从右腰部射出。这一年，我15岁，弟弟13岁”。

1968年，重庆“8·15”与“反到底”两大造反派发生大规模武斗，一位带着两个幼小男孩的母亲，在避难的路上被造反派开枪打死。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两个已经人到中年的席庆生、席庆川兄弟在讲述自己亲历的惨剧。

重庆沙坪坝公园，中国唯一现存的红卫兵墓地门口。那里的野树残碑间，葬着500多名因武斗而死的青年。一堵墓墙上写着：谁家孩子长眠于此。

席家兄弟讲述惨剧场景之后，纪录片里的镜头转向墓地门口，一群市民正在高唱的革命歌曲：“毛主席用兵真如神……”现场看片的观众发出一阵笑声。

席家兄弟后来的命运，纪录片没有讲述。实际上，即使40年后，席庆生的心灵创伤仍未平复，他把母亲的遇难称为“国恨家仇”，电话里他情绪依旧激动：“为什么无辜者被枪杀，为什么一个靠卖血养活5个子女的伟大母亲被当作活靶活活打死？”

年复一年，席庆生和弟弟来到公园扫墓，反思。同时，仇恨也在他的心里燃烧着。

他向记者说：当年，通过调查了解，得知杀母仇人苏某某，是个孤儿，当过兵，与母亲同属“八一五”造反派，“文革”后期被抓，后保释就医。席庆生迅速制定了复仇计划。当时，他26岁。

那是1978年的一天，席庆生刚刚有了女儿。那天中午，他化装后穿着白色警便服，从重庆宽银幕电影院偷来一辆吉普车，计划在中午11点40分到12点，趁医生护士出去打饭的时间，把仇人带出去勒死，连人带车甩进300多公里外的乌江。但万万没有想到，11点50分，席庆生赶到医院时，那个房间已经空了。从此以后，席庆生再没有打听到仇人的消息。

一直到现在，席庆生还是不能原谅苏某某，他始终忘不了母亲遇难时那种绝望、愤恨、痛苦的表情。

多年后，席庆生在电话里反思这一代人：如果在“文革中，我们能多受点正常教育，也不会这样子。事实是，我们长期所受的教育，是一种英雄教育、战争教育，战争在当时就像一场游戏，对年轻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那种情绪一旦有机会爆发，是非常可怕的……

片子缓缓地流动。观众的又一阵苦笑，来自一个老人回首监狱生涯的感慨：“没有想到，有一天，我还能站在这里。”但很快，笑声被另一种残酷的感情代替。

老人讲到他在枪毙反革命现场的见闻：“每次有人手拿一根棍子，上头有个圆环，行刑前那人手指上套着圆环将棍子旋转，每枪毙一人，警医上去摸脉搏，用听诊器听心跳，如发现脉搏或心跳，那人就上前用棍子戳进枪孔中使劲搅动直到犯人死去。我在监狱中经常吓得大喊‘别杀我！别杀我！’”

1969年，这个叫任毅的南京知青，因为创作了传唱全国的《知青之歌》，委婉地表达了对故乡的留恋、对前途的莫测，被当作破坏上山下乡的反革命逮捕，历经上百场批斗、一次次陪绑枪毙、9年劳改之后，才活下来。

拍片前几个月，任毅和两个难友到当年的监狱旧地重游，三个人整齐地站在警戒线前3米，像从前一样，异口同声地喊了一声：报告班长，犯人进去。那一瞬间，三个人心里都是无比悲凉。

当初悲剧的根源是什么呢？面对记者，任毅说，我突破了那个时代的底线，说了100%的真话，而遭受了彻彻底底的摧残。

“对于过去的苦难，保持沉默，就等于白受了。我们就是告诉人们那一段历史，不能够再重演。”任毅曾经给中学生作报告，讲他的经历，几千人的会场，鸦雀无声，学生从来没有听得那么认真过。

但是，后来的效果却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是，那些孩子在发表感言时，讲出这样的话：我们要是生活在你们那个时代，该多好啊！没有人管，可以造反，到农村去……

◇ 忏悔和宽恕

“青春期莫名其妙地来了……我爱上了一个比我大两个年级的姑娘。”

徐星犹豫了很久，提笔写了生命中的第一封情书。那是1972年冬天，在北京××中学，他16岁，上初三。

与刘自立的觉醒相比，少年徐星在激昂高亢的革命声浪中，开始了初恋。初恋的感觉幸福而晕眩，却是见证了那个年代人性的扭曲，与宽恕的力量。

情书寄出去了，他等来的不是革命时期的爱情，而是公安局岁月。

片子里，那个叫颖韬的姑娘，30多年后，特地从美国赶回来，讲述情书的故事：“那是一封发自内心的，很大胆的匿名信，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文革’的不满。”

“我当时特别害怕，把信反反复复看了很多遍。”由于父母不在身边，颖韬不知所措，她最后把信交给班主任，一个从公安局下放来的教师。班主任一点表情也没有，再后来，他用胜利者的神态，告诉她：我们把他抓住了。那一刻的颖韬，心如刀绞：我们这样信任老师，他却利用了我们。

“从公安局出来后，我成了不良少年，出于对社会的失望，我在学校里混日子，后来到了陕北，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纪录片没有具体介绍徐星的蒙难，它以上述画外音结束了对情书事件的叙述。

徐星告诉记者，30多年后，自己才从颖韬处得知，班主任用鉴别笔迹的方法，最终找到了他。接着，公安局的人把他从家里带走，要他交代反动思想的来源，这以后，他被关了四十多天。

情书事件以后，徐星再也没有找过颖韬，他觉得自己看错人了。1975年，他高中毕业，然后插队，入伍，1981年复员回京。再见到颖韬时，已是十多年后，她在教书，他在写小说，各自生活在自己的轨迹里。直到2007年，拍完纪录片，即将回美国的颖韬在机场，对徐星说出压在心底的忏悔：“这事情，我永远不能忘记，不能原谅自己”。

离开学校以后，徐星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老师。拍片时，徐星曾经想找到他，但是没有找到。在徐星印象里，他今年应该70多岁了。在当年的全班照片里，他坐在第一排的中间。照片在纪录片里放出来时，为了保护肖像权，他的面部打了马赛克。

“我一点也不恨他。在我看来，他是个不错的老师，也是个受害者，当时两个小孩子把烫手的山芋抛给了他。在那种环境下，他也只能这样做。”徐星说，在那个特定历史时期，人性被扭曲被伤害，是非常残酷的，而展示自己的黑暗过去，正是对自己人性的审视。

关于人性的扭曲，徐晓在接受采访时称，她有时也在想，如果再回到当年的批判会，自己会不会打人呢？她觉得也很难说。“当年批判人，所有人都要参加，个人完全没有判断力。至于社会上忏悔者少，我想，可能是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不觉得是个人问题。具体到个人，我会觉得当年很荒谬，我很可笑，但是没有个人的羞耻感。”

◇ 每个人都是一部历史

这部片子，徐星已看得有些麻木了。

2007年底，拍了两年的片子杀青时，他心里一片茫然，曾经的伤痛让他沉重。这沉重，使他在上海的放片会上遭遇质疑。

那是影片结束时，掌声和灯光一起降临，1米88的徐星，站起来答观众问。

在一些观众看来，这部纪录片不是一部“伤痕纪录片”，它并未继续1980年代“伤痕文学”式的控诉，在揭开“文革”这道中国人的伤痕的同时，更像是一部思痛录与忏悔录。上海一位大学教师说，影片的示范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它的文本价值。如果每一个人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梳理自己的历史，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文革”。

不同的声音仍然存在，一位学者质疑徐星的“文革”叙事过于主流。一个80后的姑娘徐星：为什么一定要记住（这段历史）呢？

徐星说：不知道过去，就没有未来。

姑娘问：为什么不能轻松一些呢？

这让徐星感到非常悲哀：历史真的被遗忘得很快，这个社会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只用了几十年，就把人从以前的“革命者”变成了消费者。

片子在北京放映时，一位老先生说：“我问过现在的年轻人知道四人帮吗？有人说‘知道，就是马恩列斯。’也有人说‘是香港的四大天王’。”

刘自立认为，对于历史的无知，源于某种强迫遗忘症。他说，人们既要到现在社会上不幸的人有恻隐之心，也应该对历史上无辜死难的人，抱有是非感和同情心，否则，我们将无异于禽兽。

“文革”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也触动了观映的年轻人。一位80后的青年，在博客里写道：对于我们这一代80后的人来说，“文革”是尘封的历史，它充满了神秘色彩，吸引着我们的好奇。它也许是《青红》里的悲惨世界，又也许是姜文所描写的《阳光灿烂的日子》……

一位电影爱好者，受徐星的启发，准备买部DV，把父亲的“文革”岁月拍出来。

□ 原载《南都周刊》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